

# 長衫的時尚觀察—日治晚期臺灣女性的 自主性意識展現

原來

明道大學時尚造形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在日治晚期，殖民政府對於政治經濟教育的強力規範之下，臺灣人能夠展現自主性意識的管道不多，而源自於上海旗袍樣式的「長衫」卻異軍突起，縱然殖民政府頒布法令推廣標準服，臺灣女性仍然穿著並遍布於臺灣街頭，長衫服飾在臺灣人自主性意識展現上佔有一席之地，也證明時尚與認同心理是可以突破政治經濟教育的壓制力量。

關鍵字：殖民、日治時期、長衫童

# **Cheongsam as a Fashion — Taiwanese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Demonstrated During Lat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Leo Yu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ashion Imaging, Mingdao University

## **Abstract**

It is found by this paper that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exercised every powerful control over the Taiwanese through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means during its late occupation perio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Taiwanese had only very limited channels to express their self-awareness. Nevertheless, the “cheongsam” derived from Shanghai qipao were so popular among Taiwanese women that they could be seen everywhere in Taiwan, even though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had issued laws and decrees to promote standard suits. It is clear that cheongsam wearing was a tacit way to express self-consciousness among Taiwanese women. It also proves that fashion and identification can go hand in hand to break through the repressive force formed b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means.

**Key Words:** Colonization,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Cheongsam

## 壹、前言

日本治台時期自 1895 年至 1945 年，我們通常稱某一時期的年輕人是 X 世代、Y 世代，一個世代沒有規定多少年，但是若粗分一世代二十年，則日本治台五十年，其實已經至少經歷了兩個世代，本文集中研究於日治晚期 1930 至 1945 年，主要係著想於日本已經治台三十五年以上，這個時期剛好是日本政府擁有稱頌臺灣治理文明化的政績，加上當時正值戰爭期間與皇民化運動的政治壓力，臺灣人經過長期受日本殖民統治後，對於日本文化的自主性意識如何？相對地，日本政府已經統治幾十年，日本人可以接受臺灣人為日本人嗎？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政府便一改之前的「同化主義殖民政策」，而改採「皇民化殖民政策」，以更積極的、更為強迫的，全面性的高壓同化政策，以達到臺灣人民效忠日本為目的。從臺灣人的觀點而言，皇民化並不是想要將臺灣人變成日本人，而是想要徹底地消滅臺灣人的民族認同與文化。文學批評家尾崎秀樹便寫道：

盧溝橋事變(中國事變)之後，鎮壓強化了。在皇民化的禁令之下，使用中國字和表演中國戲曲遭到禁止。臺灣—中國式的廟宇和宗祠遭到廢止，宗教信仰也受到壓抑。師範學校中講台語的人會受到處罰；甚至傳統私塾也遭警察強迫關閉。……文學方面，在昭和十二年(1937)後，絕對

不可能以中文出版。如果要出版，一定是使用日文。(尾崎秀樹，1991)

在到處封殺臺灣人自主意識表達的環境下，並且以近乎洗腦方式進行「民族改造」的意圖之下；臺灣人，甚至臺灣女性如何表達自身的認同感，以及對於日本異族的文化他者表達，本研究即以長衫在當時街頭的時尚觀察，或可成為臺灣女性自主性意識展現之表徵。

## 貳、日治時期背景環境

日治時期的臺灣沒有多少空間展現主體性意識，政治方面無庸置疑是由日本政府掌控，經濟方面由臺灣提供農產品交換日本工業產品而形成了不等價交換機制 (the mechanism of unequal exchange)，臺灣本身的工業與農業也是由殖民母國日本所規劃與控制的；甚至對於臺灣的知識，日本也是徹底地控制著。

在日本統治之下，臺灣很可能稱得上是全世界被調查的最詳細最完整的殖民區域。每年有大量的統計數據、特殊的數字調查不斷地被編纂。經濟、地勢、原住民部落、礦藏、農產品、工業產品、以及外貿等全部都被調查及再調查，一直查到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再加進原先的知識之中。(Barclay, 1954)

日本調查得越詳細，身為殖民地的臺灣就被控制得越徹底，面對知識權威的日本政府，臺灣人根本無處可躲，而臺灣人的主體意識也在重重的政治經濟枷鎖下無法萌芽。

## 長衫的時尚觀察—日治晚期臺灣女性的自主性意識展現

教育方面，日本對於臺灣人的教育方針就是要成為帝國臣民，說日本話，食衣住行都要像日本人，在同化政策的運作下，執行得越來越徹底。1930年代後的皇民化政策，更明顯影響學校及社會教育，1937年因應戰時體制，廢除了公學校之漢文課，漢文課程從日本統治初期原是扮演一種緩和及接納固有臺灣文化之角色，然而漢文之教授從1910年代開始就計畫性地減少，因為漢文之教授顯示漢文隨時會喚醒臺灣人潛在之中國意識，妨礙日語之學習與日本國民精神的養成。(曾素秋，2003)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為了加快教育每一個本島人，成為真正具有日本意識、大和精神的日本人，所以，不厭其煩的天天灌輸皇民意識。每天朝會，照例要升旗。升太陽旗時，要聽著歌頌日本皇室萬世興盛的國歌(在講堂時則要齊唱)，以注目禮望著太陽旗如太陽般冉冉上升。大約在太平洋戰爭一周年起開始唱「隨軍征海」歌——表達決心隨時隨地為天皇獻軀效忠的歌。在結構上接在國歌之後，由於悲壯至極，所以，在唱完國歌後唱出來時，不由得會慷慨激昂起來，會衝動願為天皇不惜獻出生命的一種情緒來。(杜武志，1997)

日本統治者為了消滅臺灣人的民族意識，所以推行皇民化期間，對於文學、戲劇創作語言，不僅強迫使用日本語文，其內容也做嚴格限制。換言之，這時期臺灣文學、戲劇的創作產生了所謂「皇民文

學」與「皇民化戲」，這些都是做為政治宣傳之用，而非文學家自由創作的藝術作品。(何義麟，1986)

當時的「臺灣演劇協會」規約第三條即說明：「本會的目的在於提供島民健全之娛樂，陶冶其情操，進而激發日本精神，推進皇民奉公運動，並謀求改善提升戲劇，以使島民徹底認識時局。」(濱田秀三編，1943)可知為了執行皇民化政策，日本政府是全面啟動，臺灣人無法躲避。

但是，在實施同化主義的殖民政策下，被殖民者臺灣人仍存有差別待遇，畢竟臺灣人民是二等公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在接受了新式教育與民族思潮之影響，臺灣人民也展開了一連串的民族運動，如六三法撤廢運動、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台中中學成立，《臺灣民報》發行、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眾黨成立等，但是這些政治性活動都被視為是臺灣人民想要脫離日本人的統治，都受到強力的打壓，而致功敗垂成。

以「六三法撤廢運動」為例，「六三法案」係為授權立法制度，由日本政府之議會授權臺灣總督在臺灣發布與法律有同等效力的「律令」，倡議撤廢「六三法案」等於是否定臺灣的特殊性，這是「同化主義」政策思想的實踐，也是肯定「內地延長主義」，主張殖民地應同化於其母國(日本)，應將日本本土的法制直接施用於臺灣。有別於同化主義的是「自治主義」，林呈祿為此派的領導者，他主張依立

憲政治原則，應在臺灣設立符合臺灣民俗風情的制度。

由實際上考察之，吾人亦同情於（日本）政府向來所引為疑懼者，即有悠久之歷史，具特殊之民情、風俗、習慣，保持固有之思想與文化的現在三百四十萬漢民族，能否使其與日本大和民族，站在純然同一制度下，而加以統治，卻不無疑問。（林呈祿，1920）

運用政治與經濟手段，殖民政府可以對殖民地的人民、土地、資產進行威壓、箝制、榨取、剝削等方式，其出發點並非基於對殖民地人民的善意，在有形的土地資產方面，殖民地人民幾乎無法對抗殖民政府。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中之「臺灣統治現狀」一節中，敘述臺灣在因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集中於總督一人的獨裁政治現狀，包括官選的總督府評議會、官選的州市街庄協議會都只是諮詢機關，台人苦情無法上達，警察統治以保甲連坐為輔助、刑法上殘酷至極的匪徒刑罰令、人權上的中國渡航護照之限制、經濟上的專賣稅賦壓榨等等，種種統治手段「皆非使臺灣為日本帝國延長之方針，只供為日本移民經濟榨取地而已。」（陳翠蓮，2002）

### 參、臺灣人民發聲的管道

縱然在政治、經濟，甚至正規教育方面臺灣人沒有置喙的空間，但是在文化方面，殖民政府雖有著力卻成效不大，但為了將殖民政府自認為優異的文化與生活

方式移植至殖民地，殖民政府所持的殖民主義經常以簡化方式—相對的二元論述，殖民者/被殖民者、文明/落後、現代/傳統，這樣的邏輯雖然可以了解殖民國家的運作方式，卻無法解釋其中的兩個文化互激的複雜問題，同時也不全是事實。

以臺灣人民不同意「同化主義」，在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請願書中即述明：……同化政策係對歷史、信念、民情、習慣迥異之臺灣悉如日本內地各府縣而統治之，且施行內地社會所行之全部法令，務將臺灣人固有之特性消滅混合統之。然而凡抹煞民族之歷史，勢必使其盲從本國之思想習慣，如此不但不自然而且必至無視其發達所需要之社會需求。此在本國移民比較殖民地土著人為多之時，或於無歷史之野蠻人所居住之地方強行之，或可收幾分效果，然在文化歷史相當發達之地方，如欲強行之，必將成為激發反感之原因，此為古今史實所證明者。……（黃敬嘉，2002）所以，就文化而言，是無法被分為文明或野蠻這麼粗糙的分類，簡單的二分法只是圓了殖民主義進行掠奪資源的理由而已。

另一方面，被殖民者受限於受殖民者控制，在某些方面無法展現其「文明」、「現代」的一面，但是在一些殖民者無法全面掌控的領域，被殖民者也有空間可以展現其自主性意識；甚至某些時候，無論殖民者如何地宣傳、鼓勵、頒布法令，被殖民者還是有機會、有理由、有空間展現其自主性意識，本文所討論的「長衫」就是一例。

## 長衫的時尚觀察—日治晚期臺灣女性的自主性意識展現

日本必須維持其「優越文明」的殖民者地位，相對於臺灣則必須維持其「原始、落後」的印象，這樣日本才能夠利用「文明」、「現代」的差異性，繼續引導臺灣人朝向日本文化認同的道路前進。這樣的論述無法適用於時尚領域，臺灣女性穿著「長衫」突破了上下階層的差異性觀念隔層，臺灣女性在時尚方面展現了自主性意識，也展現了「文明」與「現代」的一面。

尤其是日本在政治、經濟、教育等全面地進行同化政策的密網之下，甚至服飾方面日本政府也有頒布法令規定，「長衫」這個在當時臺灣地區的時尚產物可以突破殖民架構，流行於臺灣地區，時尚的力量實不容小覷。

### 肆、長衫穿著的自主性意識展現

臺灣早期慣稱旗袍為長衫，意即長及腳踝的連身衣著，源於上海的旗袍樣式，臺灣人卻堅持「長衫」(圖 1)用詞。長衫在臺灣服飾歷史上可以佔一席重要地位的原因在於，殖民政府對於服飾的制定與推廣一如政治經濟的手段一般的積極，而日治晚期適逢戰爭時期，連日本本土都極力推行標準服，並制定法令規範之。

「國民精神總動員台北支部」曾印行《改善本島婦人服飾》之小冊子，在其「改善宗旨」即載明：穿著支那式衣服生活，在不知不覺中所培養的國民意識、國民感情與促進皇民化運動之宗旨必定無法相容，這種情形絕不可忽略，必須給予適當的指導。日常的服飾可以潛移默化地改變國民意識，所以為了擺脫臺灣人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為了皇民化的目標，日本政府鼓勵穿和服或標準服的意圖是很明顯的。

為了配合戰爭進行，1930 年代日本政府注意到統制服裝的重要性，於 1940 年 1 月發表以男性為對象製作的「國民服」；並於 1942 年公布六種形式的婦人「標準服」(圖 2)，三款為傳統和服之改良型，另外三款為上衣採日本式領口交叉傳統的改良式洋裝，但是男性的國民服和女性的標準服在推行的績效並不佳。

高壓手段進行的同化政策實施五年以後，在 1942 年 9 月桔梗俱樂部分別在台北市榮町(日人活動區域)和太平町(臺灣人活動區域)分別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臺灣人極少穿和服與標準服，整體而言，洋服和本島服佔了 81.4%，請見表 1 調查結果：

表 1：1942 年台北市街頭服裝調查結果（桔梗俱樂部調查）

	榮町		太平町	
	年輕女性	中年以上	年輕女性	中年以上
標準服	2	0	1	0
洋服	643	220	583	100

和服	104	416	12	19
本島服	11	143	170	553
合計	760	779	766	672

資料來源：編輯部，〈皇民奉公會主催「生活科學展に拾ふ」〉，《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12 號（1942），頁 36-37。

這是以日本人的立場看臺灣的服飾，因此所稱之本島服，應涵蓋臺灣服、長衫、本地服等，根據吳奇浩(2012)說明，自清代以來服裝因為要與洋服、和服區分，開始有「臺灣服」、「臺灣衫」、「本島服」、「灣服」等名稱出現；而一般人通稱「平常的衣服」即是臺灣服，臺灣服涵蓋長衫、短衣、本地服，以臺灣服名稱就是用來表現「臺灣人的本來面目」，以與日本區隔。這個現象對於於臺灣早期畫家描繪的仕女油畫，畫中的女性大多穿著洋服和本島服(含長衫)入畫，亦可窺視當時服飾流行的趨向。

為何在皇民化運動及「去中國化」之政治壓力下，臺灣女性仍然時興洋服？Taylor（1990：25）對認同（identity）解釋為：認同一詞在此表示一個人對於他是誰，以及他做為人的本質特徵的理解。江宜樺（1998：12-13）則定義為：是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己在時間空間上的存在，這個自我認識、自我肯定的過程涉及的不只是個人主體對自我的主觀了解，同時也包含了是否他人對該主體也有同樣或類似的認識，也就是說，主體性之證成必須透過其他主體對自己承認與肯定，因此每個主體與其他主體都必然發生一種「互為主體性」的現象。

殖民同化政策在實際推行上其實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在兩個不同民族之間要執行同化的體制與意識形態，這兩者已經是高度矛盾了，李妍淑寫道：日本人越是堅持國體的自然化概念，理論上就越不可能同化其他民族。要同化不同的民族，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須在一開始形成日本民族時刻意將他者移植進來。如果是這個情況，同化他者的可能性意味著國家與其人民的關係可以是人造的，而不必以「自然關係」為根基。（イエンスク李妍淑，1996）

認同的形成必須有差異的存在，也就是說，在尋求共同性的同時，也要尋求差異性，所以在異民族統治的情境下，日本人統治/臺灣人反統治的邏輯結構造成了臺灣人民心理上與殖民國的區別。相對地，日本人也有同樣的感覺，和服是否要推廣至臺灣地區，在日本也引發質疑，特別是日本人已經統治臺灣長達三十五年了。

在昭和五年（1930 年）出現的臺灣社會介紹，標題為「異國的臺灣與臺灣人的習俗—提早了解臺灣」，其標題明示要「早わかり」（提早了解），標題中的「異國的」三字旁邊，還特別標音為工キゾチツク，也就是英文的 exotic，並不是使用

一般讀音いこくてき(蘇碩斌, 2006), 可見日本人還是沒有認同臺灣人為日本人。

日治晚期經過長久的殖民地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下, 臺灣婦女面對遭遇戰爭體制帶來效率化的迫切需求, 在認同與差異的民族情感下, 流行服飾幾乎是可以突破殖民政府壓制的主要「出口」, 因為服裝習慣同時具有社會性與個人性, 即使殖民地政治積極介入臺灣女性服裝行為, 大多數的閩族臺灣女性對時尚、對新身體展現, 這些自主性意識是無法受到控制的; 因此, 服飾文化作為社會生活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價值觀念取向和國民精神實質。

### 伍、臺灣女性自主意識與女性消費

1930、40 年代是上海旗袍的全盛時期, 這個可以展現中國忸姓亭亭玉立、身姿妖嬈的服飾, 和同時期歐洲在二次戰後 Christian Dior 的 New Look 展現玲瓏曲線的合身造型的意義大致相同, 女性不再遮掩, 而是展現自己的身材曲線; 台灣的長衫源自於上海旗袍, 其產生的源由也與當時女性自主意識與女性消費風氣興起有直接之關聯性, 特別是 1930 年代「女給時代」咖啡店文化的興起, 以及女性大量投入職場, 更促使女性對於服飾流行的關注。

自 1920 年代開始, 臺灣女性的自主意識逐漸展開, 根據楊翠(1993)的研究, 當時在《臺灣民報》即有些言論, 討論婦

女婚姻、教育、經濟、參政等議題, 大正 14 年(1925 年)2 月 8 日, 彰化地區的婦女知識份子組成臺灣第一個婦女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 1926 年「諸羅婦女協進會」相繼成立; 昭和 2 年(1927 年)新文協在會則第七條中, 明確規定設置婦女部; 大正 15 年(1926 年)成立的臺灣農民組合, 也於昭和 3 年(1928 年)2 月設置婦女部, 由葉陶擔任婦女部長。由於總督府廢纏足、興女學之政策, 臺灣女性的生活空間逐漸變大, 婦女開始投身職場, 雖然大多侷限在護士、助產士、教師、女工及服務性質之公車車掌、交換姬(電話接線生)、女給(女招待)等職務, 但已呈現出新興氣象。任看護婦、助產士、教師必須學有專精, 即使是當電話接線生和車掌也要具備公學校畢業學歷, 因此, 職業婦女的出現是日治時期女子教育日漸普及的成果。(李毓嵐, 2009)

臺灣的女性開始有了自我, 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 以及想要掌握自己未來的女性自覺意識; 而當時的社會就是「解放而不豪放」的氛圍, 對於某些價值觀還是十分堅持, 但是女性也因為生活圈擴大, 觀念活潑, 開始爭取自由戀愛、自由就業, 根據蔡蕙頻(2013: 19-20)的描述, 1938 年的一次調查顯示, 即將於該年 3 月畢業的臺北第一高女 211 位女學生中, 有 76 名打算就業; 第二高女的 161 位畢業生中, 有就業計畫的高達 77 名; 第三高女的 141 名學生裡, 則有 41 名走出校門後即將踏入戰場。臺北三所頂尖女校中

，將來想成為「粉領族」的，普遍有三成左右甚至是接近一半的比例。

臺灣女性開始有身體的自覺性的成因之一，也與當時的日本政府對臺灣實施女子體育教育關係密切。解纏足之放足運動的推行，以及體操課納入學校教育，以遊戲或戶外活動等簡便的運動，激發女學生對於體育的興趣，進而演進至國防體育的推動，這使得廿世紀初期的臺灣女學生能以自由地操控自己的身體，參與遊戲及體操，直至 1920、30 年代，許多女子高等學校甚至將健行、登山、體育競賽等納入整體女子體能教育之範疇。

新身體改變女學生的生活空間，甚至影響她們日後的發展。……能夠為畢業後的生涯規劃做更多的選擇，不再以照顧家庭為唯一，因此有的學生選擇出國留學繼續深造，有的則外出工作成為職業女性，而新身體正賦予她們有利的發展條件。（游鑑明 2000：47）

經過女子體能教育的洗禮，讓當時的女性對於自己的身體萌出自主性意識，「新身體」儼然為臺灣女性帶來新的生命體驗，在服裝的展現即可說明，傳統旗袍呈現直線寬鬆的形式，時至當時的上海和臺灣，新式旗袍則強調女性身體曲線，當時的女性開始欣賞與展現自己的身材曲線（圖 3、4），這樣的時尚意識，自然拋棄了無法描寫女性身體的モンペ（燈籠褲）、和服，以及標準服。

殖民政府的體育教育在文明化與解放身體的旗幟下，其實隱藏著殖民者的種

族歧視與差異論—殖民者因著到達現代的優先位置，衍生出自我文化與精神的優越性，進而形成種族優越的信仰。（陳雅萍，2011）體育教育的日本化，並非是將臺灣人變為日本人，相對於生活條件、思想意識的同化，主要的目的是透過現代化體育教育，將臺灣人的身體塑造成為現代身體，以成為臣服日本的現代國民。（鍾俊敏，2006）縱然臺灣的女子體育仍然存在著日本殖民的優越感，但是臺灣女性也獲得了對身體的全新體認，更間接地影響了臺灣女性對身體描寫的時尚意識。

流行時尚的服飾大多往便利性、當地氣候等因素考量，政治性考慮很難切入與控制，這與政治、教育、文學、戲劇等方面相當不同，如果服飾改革的用意只是培養臺灣人具備日本國民意識，而不是改善陋習，或是更為舒適，每天必須著衣的婦女是無法接受的；換句話說，時尚流行的必要條件應該是實質用途大於形式意義，皇民化政策施行至服飾改革，只會流於形式主義，這樣的措施就連日本人本身都有反省的聲音出現：捨棄活動上較方便的臺灣服相當困難。如果和服非常便利，人民自會穿用，然而和服卻是價格昂貴又極不方便。將臺灣女裝改為洋裝上有可能，獎勵和服則毫無意義。（中村哲，1941）

正如小說家張愛玲所言：時裝的日新月異並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好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於其他活動範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裏去。在政治混亂期間，

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祇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裏。(張愛玲, 1991)政治, 並無法左右女性對時尚的追求, 即使是強大政治壓力的日治晚期, 臺灣女性對於身體描寫的慾望, 仍然有她們可以自主的主張, 而普遍在臺灣街頭看到的「長衫」, 卻是臺灣女性展現自主性意識的最佳「戰果」。

### 陸、長衫時尚意識展現之時代意義

衝突, 創造了聯合和聯盟, 而「認同」更是促使聯盟之重要因素。衝突不僅增強了一個現存團體的內聚力, 徹底消除了所有可能模糊敵我界限的因素, 而且把在其他方面毫無關係的個人或團體集合到一起。(科塞, 1991: 157)面對衝突, 就是「生存競爭」的議題, 這時候的聯合與結盟就符合了同意結盟者的最大之共同利益, 為了保護這個共同利益, 他們也會聚合起來與其他領域競爭。而群聚的成因很多, 族群、儀式、生存條件皆可成為「認同」的要件, 這個「認同」與區辨在真實的生活當中至為重要, 因為人們集體地區辨自己和他人, 我群和他群, 或是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和日本人, 就是以「群體認同」來過日常生活。

面對日本高壓式的教育模式, 面對自身臺灣人之華人血統與日式洗腦教育的衝突, 時尚表達在日治時期竟然可以成為臺灣人展現「社會認同」、區辨我群他者

、集體結盟之重要表徵。

雖然服飾的選擇與當地氣候環境的關係甚大, 臺灣地處亞熱帶氣候實在不適宜穿著日式和服, 但是適合於臺灣的モンペ(燈籠褲)和標準服仍然無法在臺灣流行, 年輕女性鍾情於洋服和本島服(含長衫), 一方面洋服和本島服(含長衫)適合臺灣環境穿著, 另一方面也可以適度地展現出女性的身體曲線, 特別是女子體育教育讓臺灣女性有了新的身體自覺意識。特別本島服當中的長衫, 這個源自於上海旗袍樣式的服飾, 有一種屬於華民族的認同感, 在日治時期強力宣導標準服的壓力下, 臺灣女性仍然堅持穿著長衫, 或是追求時尚洋服, 「時尚」以及對美的追求在這個時代有了另一層意義, 透過對於服飾的選擇權展現了臺灣女性的自主性意識。

這個看似平常的自主性意識在日治時期顯得非常顯目, 特別是在教育、語言、藝術展演等方面完全受到日本政府的控制, 皇民化運動更行壓制之下, 滿街的本島服(含長衫)和洋服等於是華民族和西方文化的表徵, 甚至可以說是「無聲的抵抗」。

或者我們可以說時尚意識的抬頭是植基於女性自主意識的喚醒, 但也必須配合社會觀念的開放、教育、職業等多方面的開放配合, 女性自主意識才有機會提升; 一九二〇年代, 日本社會正值大量商品化與消費文化形成的大正民主時代, 許多留日的臺灣人帶回新穎的美術觀念及文化價值, 與臺灣本土的文化運動互相激盪,

加上社會商業與文化活動頻繁。直至一九三〇年代，臺灣吹起咖啡店消費和女給(女招待)旋風，將摩登與戀愛成為商品，以吸引男性顧客上門光顧。一個「摩登」兩字的意識就抵擋了日本文化意識的灌壓，以女性另一個職業「女車掌」為例，這也是當時「摩登」的象徵：日日跟隨自動車，收錢喚客興無涯；時裝本事尋常事，漫為摩登誚語加。(黃石輝，1935：7)因此女性投入就業行列的風氣也促使了女性消費的興起，。她們總感覺和上一代的女性相比，自己已經很幸運了。她們有職業、有收入，活得很有自信，她們燙髮、穿洋服、腳踏皮鞋，出外看電影、談戀愛、喝咖啡，收入可能不高，但怎樣都是靠自己的能力擁有了一份收入。(蔡蕙頻，2013：28)當然，就業並不是當時女性的最終目標，期待婚姻的傳統價值觀，不想成為未婚的「剩女」之恐懼仍然存在；但是女性對於流行趨勢的注意，過去與現在皆然。

反觀今日在全球化媒體環境下，時尚的追求趨近於全球同質化的當下，對於服飾的品味受到明星與精品品牌的引導的當口，消費者挑選服飾穿著的品味看似多樣化，但是卻少了一個「自主性意識」，我們有沒有穿出屬於臺灣文化的在地風格，特別是西方強勢文化霸權所主導的時尚品牌之下，似乎我們是在競逐別人文化！當我們回顧日治時期長衫的「流行」，感受到當時臺灣女性選擇長衫做為屬於華人民族的認同表徵，不僅更感受到時下消費

者只追求表面的美，而少了一份深層的民族認同情感，同時也對「時尚」有更深刻的理解，「時尚」也可以是一種集體認同的表徵，甚至可以成為當代的文化符號，只要我們多注意臺灣原有的人文特質即可。



圖 1：白雲紗女長衫。轉載自林尚瑛(2002)。館藏臺灣早期閩籍女性服裝概說。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2 期(2002 年 10 月)，高雄市：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頁 6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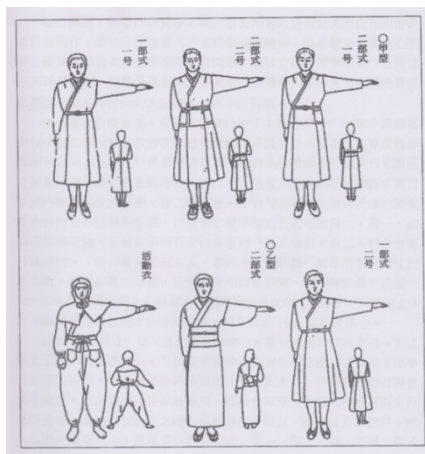


圖 2：婦人標準服。資料來源：《被服》，

## 長衫的時尚觀察—日治晚期臺灣女性的自主性意識展現

卷 13 號 2(1942 年 3 月)。重引自：村上雍子，〈たかがモンペ、きれどモンペ—戦時下服装の一考察—〉，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會編，《戦争と女性雑誌—1931~1945 年—》(東京：ドメス出版，2001)，頁 263。轉載自洪郁如(2009)。旗袍・洋裝・モンペ(燈籠褲)：戰爭時期臺灣女性的服裝。近代中國婦女研究。第 17 期(2009 年 12 月)。頁 47。



圖 3：陳進(1907~1998)。悠閒。膠彩、絹。創作年份：1935。136\*161 公分。台北市立美術館藏。轉載自曾芳玲執行編輯。紅妝大眾：臺灣前輩畫家繪畫中的女性影像與時尚品味。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頁 27。



圖 4：李石樵(1908~1995)。市場口。油彩、畫布。創作年份：1945。149\*148 公分。李石樵美術館藏。轉載自曾芳玲執行編輯。紅妝大眾：臺灣前輩畫家繪畫中的女性影像與時尚品味。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頁 73。

## 參考文獻

- 中村哲(1941)。文化政策と皇民化問題。  
**臺灣時報** (昭和 16 年)，頁 11。
-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市：揚智文化。
- 杜武志(1997)。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新北市板橋區：北縣文化。頁 281。
- 尾崎秀樹(1991)。近代文学の傷痕。東京：岩波書店，頁 106。本段文字擷取自荊子馨(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台北市：麥田出版。頁 133-134。
- 何義麟(1986)。皇民化政策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3-114。
- 李毓嵐(2009)。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女性觀。**臺灣史研究**。第 16 卷，第 1 期，頁 87-129。
- 吳奇浩(2012)。喜新戀舊：從日記材料看日治前期臺灣仕紳之服裝文化。**臺灣史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頁 201-236。
- 林呈祿(1920)。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臺灣青年**，第五期，大正九年十二月。轉載於王曉波(1985)，**臺胞抗日文獻選編**，台北：帕米爾書店。葉榮鍾、吳三連、蔡培火等(1990)，**臺灣民族運動史**，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頁 107。本段文字擷取自黃敬嘉(2002)，**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台北市：臺灣商務(2002)，頁 378。
- 科塞著，孫立平等譯(1991)。社會衝突的功能(原作者：Lewis A. Coser)。台北市：桂冠。(原著出版年：1956)
- 國民精神總動員台北支部(1940)。**本島婦人服裝の改善**。台北：國民精神總動員台北支部(昭和 15 年)，頁 1。
- 陳雅萍(2011)。解放與規訓—殖民現代性、認同政治、臺灣早期現代舞中的女性身體。**戲劇學刊**。14，頁 7-40。
- 黃石輝(1935)。女車掌。**詩報**，第 114 號，頁 7。1935.10.01。
- 黃敬嘉(2002)。**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台北市：臺灣商務，頁 385。
- 張愛玲(1991)。更衣記。**流言**。台北：皇冠文化。
- 曾素秋(2003)。**日治時期臺灣國家認同教育之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頁 71-72。
- 葉榮鍾。**臺灣民族運動史**，頁 117-119。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 372-374。本段文字擷取自陳翠蓮(2002)，**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再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游鑑明(2000)。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頁 1-75。
- 楊翠(1993)。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

## 長衫的時尚觀察—日治晚期臺灣女性的自主性意識展現

- ：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台北市：時報文化。
- 編輯部(1942)，皇民奉公會主催「生活科學展に拾ふ」，**民俗臺灣**，第 2 卷第 12 號，頁 36-37。該表擷取自洪郁如(2009)，**旗袍・洋裝・モンペ(燈籠褲)**：戰爭時期臺灣女性的服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7 期，頁 31-66。
- 蔡蕙頻(2013)。**好美麗株式會社：趣談日治時代粉領族**。台北市：貓頭鷹出版。
- 濱田秀三編(1943)，**臺灣演劇の現状**，台北：丹青書房(昭和 18 年)，頁 103。
- 鍾俊敏(2006)。臺灣棒球、民族認同、和日本殖民主義。**國立體育學院論叢**。第 17 卷，第 4 期，頁 1-10。
- 蘇碩斌(2006)。觀光/被觀光：日治臺灣旅遊活動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第 36 期，頁 167-209。資料來源為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30)。**臺灣鐵道旅行案内(昭和 5 年版)**。台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 イエンスク(李妍淑)(1996)。同化は何か，**現代思想**，24，No.27，頁 156。本段文字擷取自荊子馨(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台北市：麥田出版，頁 147。
- Barclay, George(1954).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viii.
- Taylor, Charles(1990).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